

从“工学界限”到“打成一片”^{*}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深入工人群众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胡晓阳^{1, 2}, 胡子祥²

(1. 西南交通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2.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五四时期,随着“劳工神圣”思潮的风行,“与劳工为伍”成为响应时代潮流的呼声。从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农群众开展讲演,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以长辛店工运工作为基础向北方各地工人组织扩展,整个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深入群众问题上的探索和实践情况。其中,“工学界限”问题曾一度影响了革命宣传和组织深入。面对这个问题,早期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深入工人群众的工作方向,踏实、务实、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最终弥合了工学界限,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积累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群众工作的最初经验。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坚定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工学界限;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D4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4)01-0049-08

群众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将“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随着“与劳工为伍”潮流的兴起,从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农群众开展讲演,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以长辛店工运工作为基础向北方各地工人组织扩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最初探索,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坚定的无产阶级信仰和勇于实践的伟大气魄,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最初萌芽。

^{*} **【收稿日期】**2023-1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时期进步刊物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党思想形成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CDJ001)、西南交通大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校级)“伟大建党精神的育人价值挖掘——从中共早期领导人建党实践出发”(项目编号:SZSWJTU22-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晓阳(1985—),男,河北衡水人,法学硕士,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胡子祥(1974—),男,安徽庐江人,管理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一、“与劳工为伍”：响应时代潮流的呼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激化而带来的欧洲各国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展现出劳动阶级的力量，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国底层的工农群众，劳工问题也逐渐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

早在1917年4月，李大钊在谈及学生问题及解决之道时，即以欧美社会的妇女问题、工人问题为例进行类比阐释，指出阶级剥削使得欧美国家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2]85}，并特别指出俄国大革命的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2]85}，新俄共和国由此诞生。基于“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的考量，李大钊较早关注了俄国革命，并通过对欧战战局中各国社会党平和运动的剖析，认识到“社会党之行动颇足与莫大之影响于战局，则为不可掩之事实”^{[2]123}。李大钊通过对欧洲各国社会党平和运动的观察，一方面对各国社会党的运动模式有了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察觉到国民之势、工人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

1918年1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为参战的中国劳工欢呼，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同时，李大钊也指出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他高呼“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2]255}，并将其视为一个只能迎不能拒的世界新潮流。此后，劳工话题迅速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围绕劳工话题的各种讨论也逐渐热烈。知识分子普遍察觉到“现在劳工社会，已经渐渐觉醒”^{[2]291}，必须对战后世界上新起的劳工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为此，李大钊强调在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中国设置劳工补助教育机关的必要性，主张在民主精神的引领下强化劳工教育。同时，他将对劳工问题的解决与青年教育结合起来，提出“想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304}。李大钊积极向青年们宣传“尊劳主义”的劳动伦理观，指出“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2]318}。他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肯定劳动的价值：“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2]319}他希望青年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到劳动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苦痛，解脱他们的苦痛。他积极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做“农民伴侣的青年”和“现代文明的导线”，以民主政治的精神改造农村生活、造就进步的组织，“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2]306}，从而消灭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陈独秀在《贫民的哭声》中描绘了北京底层劳动人民的苦况，痛批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并从欧洲、美国、日本预防社会革命的政策预感到“现在人心大变了，马上就要和从前两样”^{[3]459}。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充分展现了底层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大大影响了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看法和态度。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们围绕劳动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正如当时的人评论道：“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很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4]尽管各派别的具体主张不同，但他们对于劳动者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以及倡导知识分子投身劳动界的认识却是高度一致的。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中指出，欧战引发了各国劳动界崛起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期盼中国的劳动界“有自身所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3]520}。随后又在《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一文中提出要积极扭转“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的思想，大力讴歌劳动者——“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5]10}。他通过观察世界范围内各国劳动者觉悟的情况，将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过程分为“要求待遇”和“要求管理权”两步，并指出虽然“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5]12}，但是期望中国劳动者能认识这个方向和趋势，积

极参与工人运动。

与此同时, 各种报纸杂志也积极倡导知识分子投身劳动界。1919年11月, 《国民》杂志社发表文章, 主张在反军阀的同时实行平民政治, 就必须“加入劳动阶级的活动”, “和他们打成一片, 灌输他们的知识, 使他们有知识, 有办法, 成为无数个精密完善的团体”^[6]。《浙江新潮》在发刊词中指出: “改造社会, 将由哪一种人担任呢? 将用怎样的方法呢? 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 在于工农劳动的; 改造的方法, 在于‘自觉’和‘联合’……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 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 投身于劳动界中, 和劳动者联合一致。”^[7]施存统甚至发表文章, 为自己还不是一个工人而感到惭愧和沮丧。可见, 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分渴望跳出自己的圈子走向劳动群众, 在与劳动者的联合中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所以到工人中去, 成为当时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口号。”^①

二、“工学界限”: 影响革命宣传和组织深入的关键问题

(一) 遭遇问题: 讲演“遇冷”和“遭疑”

伴随着“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声浪的高涨, “与劳工为伍”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将口号转化为行动, 走在前列的是进步青年学生们, 其中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平民群众中进行教育普及并走向农村、工厂的实践探索最为典型。当时,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中的学生们虽然信奉不同的主义、成分复杂——“既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也有代表资产阶级右翼成分如康白情、罗家伦之流”^{[8]254}, 但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 从城市逐渐走向了乡村、工厂, 从市民走入农民、工人等劳动群众中。

值得注意的是, 1920年春季, 当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青年学生们尝试深入乡村开展讲演活动时, 效果却并不如人意, “虽有一些成绩, 但因为听众较少, 收效不大, 特别是在郊区农村或北京附近各车站”^{[8]253}。乡村虽然有广阔的空间, 农民群众也朴实可爱, 但学生最初在长辛店开展讲演的现实场面却让人感到沮丧, “虽然扯着旗子, 开着留声机, 加劲的讲演起来, 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 他们觉得没有趣味, 也就渐渐引去”^{[9]263}。而对于讲演的内容, 比如“平民教育的重要”“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读书”“缠足的害处”等话题, 听者们或点头称赞, 或持不赞同甚至反对的态度, 更有甚者视之如洪水猛兽——“当讲演时, 有一位年轻的媳妇, 才要出门来听听, 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类的话, 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9]259-260}。可以说, 学生与农民群众初次接触时彼此的界限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乡村讲演“遇冷”的原因, 朱务善曾在回忆录中总结道, “因为一则他们不感兴趣, 即有时听者不少, 可是拿郊区全部农民数字衡量, 简直是沧海一粟; 二则讲演者不知道农民生活状况, 这种讲演没有和他们切身实际结合起来, 讲与不讲, 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而且这一星期在这个村讲, 下星期又到别的村讲, 听者对之犹如耳边风一吹而过, 没有什么用处”^{[8]253-254}。

与此同时, 青年学生深入工厂走访调查、开展讲演也遇到了类似问题。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通过同学关系、同乡关系逐渐走进长辛店工人群众中, 工人对讲演的形式虽然并不陌生, 因为“这二年他们是听惯了讲演的”^{[8]257}, 但是对于学生开展讲演和接触工人的动机颇持怀疑态度。罗章龙在回忆走访工人区、尝试同工人交谈政治性问题时, 深刻感受到“工人们, 特别是老年工人, 对学生隐约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10]11}, 并言明这就是“工学界限”问题。他认为, “工学界限使学生与工人不易接近, 因而影响革命宣传与组织的深入,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0]11}。

(二) 剖析问题: “工学界限”的具体表现

^① 参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工人运动史教研室. 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资料: 第1辑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内部资料), 1959: 24.

众所周知，长辛店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职工运动的起点。从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农村开展讲演“遇冷”，到在长辛店深入工人群众“遭疑”，他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融入工农群体，“工学界限”即是对学生与工人互动中问题症结的一种集中体现。此时的“工学界限”主要是指青年学生在深入工人群众时，因身份、话语、习惯乃至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而造成的与工人群众沟通和互动过程中的界限与隔膜。

“工学界限”问题的产生，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当代表“士”阶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因潮流的触动而向底层穷苦工人靠近时，双方因身份阶层的差异而带来的观念、语言、行为、习惯等各方面的隔阂是客观和明显的。这种隔阂对于青年学生和穷苦工人双方而言实则是相互的：当时的工人生活条件恶劣、文化水准极低，他们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极端利己主义盛行”，“没有集体生活的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11]121}；而知识界也是各种思想混杂、观念各异，五四运动虽然轰动一时，但“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11]122}，一些知识分子将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无产阶级微不足道，“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11]122}。因此，这种“工学界限”在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即作为知识分子的青年学生和底层工人群众是以何种价值观念认识和看待对方的。罗章龙在回忆和分析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难以征求志愿者参加北方书记部工作的原因时，就指出“大多数会员思想上存在着顾虑，除恐耽误学业外，主要认为学生去做工人运动既无‘出息’，又无‘前途’，于己有损，于事无益”^{[10]6}。而工人群众“源于贫苦工人的自卑感，他们素来认为工人是命运安排才受苦受难，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做官为宦的人，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学生与工人并不是一伙，怎能一道结交共事呢？”^{[10]12}这说明双方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巨大隔阂。

除了以上谈到的思想认识隔阂外，从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参加北方书记部工作深入长辛店工人的具体情况看，青年学生还遭遇到很多实践上的困难，比如生活习惯方面：“由于书记部的南方同学乡音很重，生活习惯与本地劳动人民多所异趣，时时有格格不入之感。”^{[10]15}又如语言方面：“长辛店补习学校教员几乎全是南方人，南人操北语非常别扭，不止是笑话百出，有时更构成误会。”^{[10]15}再加上“来自工人以外的政客官僚对工人和学生关系的挑拨离间”^{[10]12}，污蔑学生叛逆造反，利用工人来煽动工潮、扰乱秩序等，加深了工人和学生间的隔阂，使得破除“工学界限”困难重重。也无怪乎此前陈独秀指派罗章龙负责北方书记部工作时，罗章龙以北方工人运动工作繁难、自身能力不足为由而畏难推辞。陈独秀则回应：“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可见，当时对于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工作的难度，大家普遍都有深切的体会。

从朱务善和罗章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遭遇“工学界限”问题后，青年学生中就出现了认识和实践上的分化，比如：有一些人（代表资产阶级右翼成分）认为工人群众不堪大用，仅依托讲演团以讲演的方式普及平民教育、唤起群众自觉，不愿意再继续深入探索，随后逐渐退出，放弃与劳工群众的结合；另有一些人，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始终认为工人群众的力量值得挖掘，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继续探索启发工人的方法，开始有针对性地研究和解决“工学界限”问题。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成为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宣传和组织深入的关键一步。

三、“工学联合”：消除“工学界限”的思路与方法

（一）解决思想问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对于当时工人革命运动遭遇的障碍，邓中夏指出：“我们面临着需要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

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11]122-123}可以说，这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解决“工学界限”问题的方向性把握。对于有志于“与劳工为伍”的青年学生而言，面对当时知识界认为无产阶级无知、贫穷又软弱的普遍看法，要消除“工学界限”，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进行改造。青年学生立志献身革命运动，在开始探索“如何动员工人群众”这一革命实践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动员工人群众进行革命运动”这一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一个树立革命人生观的问题。

罗章龙在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启动初期情况时，指出当时为了动员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学生会会员参与志愿工作，就曾发起过一个“关于革命人生观的辩论”，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多数会员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有了明晰的态度”^{[10]7}。随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组织辩论了“当前中国革命方向”的问题，针对群体中“对工人持怀疑态度”和“工人阶级在未来革命中必然占主要地位”两种不同意见进行反复辩论，最终肯定工人阶级地位的结论渐趋一致——“自此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多数会员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渐渐接近”^{[10]8}。也就是说，只有当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时，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会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树立起来，从而打消进入知识界的念头而选择更加深入地走进工人群众。

对于已经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早期共产党人而言，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即明确宣称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依靠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革命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同时，强调党的基本任务是深入工人群众、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12]。可以说，从理论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力量的认识是不存在“怀疑”态度的，因而化解“工学界限”问题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如何宣传动员工人群众的实践性问题，即邓中夏所说的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早期文献中关于“工学界限”的讨论、研究并不显见，仅罗章龙在回忆北方工人运动情况时曾经提到。

（二）突破实践困境：深入工人，消除隔阂

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早期共产党人而言，虽然他们已经坚定地将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来看待，但在深入工人群众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与工人在认识、生活和语言等方面的隔阂，正如黄修荣所言，“先进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并取得工人的信任，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13]。

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打开工作局面的过程来看，从事工人运动的早期共产党人选择了一条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起点是从调查工人阶级的状况开始的。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亲赴唐山煤矿实地调查矿工生活，关注工人的悲惨处境，提出改革包工制的建议。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平民教育讲演团除了讲演以外，还派遣邓中夏、朱务善、杨人杞等同志赴长辛店走访调查，同长辛店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行深入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首先从工人普遍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出发，了解长辛店工人自发组建夜班通俗学校的初衷和后续情况，细问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情形，主动调查工厂“锅伙”^①里工人的生活、工作情况并仔细记录，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务实的态度在夜班通俗学校的基础上“来办一个工人的补习学校”^{[8]259}。办校的整个过程展现出早期共产党人真诚务实的工作态度和非凡的组织能力：真正地替工人们办事，教学的内容围绕着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展开——结合工人们生产、生活实际另编教材，“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用的工具、器物都编在这课本里。要叫工人读了书就晓得他用的老虎钳子怎样写、锉刀是哪两个字”^{[8]262}。这种生动而又贴近工人生

^① 指旧时单身工人、小贩等临时组成的集体食宿处，设施简陋。

活的教材，获得了工友们的高度认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后，随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加入者日渐增多、影响逐渐扩大，形成示范效应。各地工人视长辛店为工人的“天国”，纷纷派代表前往参观学习并效仿其做法。邓中夏等讲演团成员也因此受到长辛店工人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他在描述长辛店工人群众与之的亲密友好感情时写道，“一种融合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9]281}。

此外，早期共产党人自觉地在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达等方面主动向工人靠近，使工人感到学生不是外人，以此争取工人的认同。张国焘回忆其率领一队学生到长辛店讲演时，工人们拿出开水、咸菜和馒头款待讲演的学生，“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词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地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9]338}。这种举动拉近了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距离，产生了一种“和谐感”。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南方籍教员们为了在语言上适应沟通的需要，特别编辑《应用京话词汇》供大家学习，“当时大家把这词汇揣在怀里随时阅读”^{[10]15}，以致后来可以说出对方能听懂的蓝青官话，从而消除了同工人们在语言上的隔阂。日常生活中，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教员们也是尽心尽力为工人服务，比如补习学校的专职教员李实“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们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9]342}。

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工人群众的这些知识分子深切同情工人们的遭遇，主动引导和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工人遭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而向书记部求助时，得到了书记部的细致关怀与鼎力帮助，比如：“某次修车厂工人吴国有屡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乃到北京大学西斋找书记部负责人商量对付办法”，最后事情得到妥善解决，“吴事后逢人便讲，王先生摆连环计把他从苦难中搭救出来。……从此工人中到处传开了，说书记部真不错，真正替工人们办事”^{[10]15-17}。

总而言之，对于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早期共产党人而言，弥合“工学界限”的思路在于抱着“工学联合”的目标与工人在思想、生活和语言等各方面逐渐接近，推心置腹竭诚帮助，不分彼此。为此，他们采用了宣传讲演、走访调查、深入谈话等方式走进工人内部发现工人的需求，帮助工人群众成长进步；在生活习惯和语言等方面摒弃偏见、主动适应；在涉及工人权益保障的问题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切实为工人解决问题，迅速获得工人群众的支持和认可，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开展早期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打成一片”：探索深入工人群众工作的实践启示

在深入群众的实践过程中，从遭遇“工学界限”到践行“工学联合”并最终与劳工群体“打成一片”，积累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最初经验。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新时代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走群众路线，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破解难题的根本指引。确切地讲，“工学界限”问题最初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农村、工厂的讲演实践中就已显端倪，但并未被当时成分复杂的讲演团全体成员所重视。面对当时工人阶级贫困凄惨、无知愚昧的现实状况，恰恰是讲演团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具备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当深入劳工群众的活动被“工学界限”的现实所阻隔时，才会触动其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故而围绕着解决“工学界限”问题而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可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破解难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脱胎于无

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相信人民、到群众中去不是迎合时代潮流的一时冲动, 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担当民族救亡使命、探索救国道路的必然选择。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信仰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人民立场的精神支柱。当前, 社会上重精英轻草根的倾向明显, 甚至不乏一些违背人民立场的观点和言论, 不实事求是地考虑和对待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而随意调侃人民、丑化人民, 将人民视为群氓、刁民的现象时常发生, 归根到底是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学习, 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 新时代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认真开展、长期坚持并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认真改造主观世界,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补足精神信念之“钙”, 从而坚定人民立场, 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 在党的领导下同全体人民一道凝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其次, 走群众路线, 要坚持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坚持“实践第一”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破解难题的重要原则。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理论极为深晦, 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早期共产党人曾一度拘泥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他们不太愿意从事实际革命工作, “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14], 即使有深入群众的活动, 也以社会调查和宣传讲演为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要使革命宣传和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继续深入, 就必须使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实际的革命工作中解决具体的问题。经过党的多方面努力, 很多同志才逐渐克服了脱离群众的“小组习气”, 参与到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去。克服“工学界限”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实践过程, 使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在“书斋式”的理论研究之外, 逐渐开始摸索出一条注重客观实际的“社会式”革命实践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脱离实际的坐而论道、空谈造词, 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无用, 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益。在当前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 共产党人要坚持问题导向, 发扬实干精神, 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深入人民群众, 锤炼自身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最后, 走群众路线, 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破解难题的核心原则。在走进工人群众的过程中, 早期共产党人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领下, 他们深入工人群众, 真正从客观现实和工人的具体需求出发, 为了工人群众而殚精竭虑, 实实在在地为工人群众解决困难, 最终抓住了群众的心, 获得群众的支持, 创造性地弥合了“工学界限”, 积累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最初经验。

历史经验证明: 真正为群众办事, 获得群众的拥护, 党群关系就密切, 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反之, 忽视群众的利益和需求, 虚与委蛇、敷衍塞责, 就会脱离群众, 造成事业上的困境与挫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因此, 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时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历史成就。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22-10-16)[2023-10-25]. <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11666705047474465.shtml>.

- [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3]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4] 义璋. 讨论怎样过我们的暑假生活 [N]. 民国日报·觉悟, 1920-06-17 (01).
- [5]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上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71-72.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二集(下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587-588.
- [8] 张允侯, 殷叙彝, 洪清祥, 等.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 [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共产主义小组: 上 [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10] 中国革命博物馆.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 [11] 邓中夏. 邓中夏全集: 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1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第1册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7.
- [13] 黄修荣, 黄黎.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213.
-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 第2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 85.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68.

From the "Boundary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s" to "Integration with the Masses of Workers"

—— A Study of the CPC's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Deepening the Masses of 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HU Xiaoyang^{1,2}, HU Zixiang²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56;
2.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56)

Abstract: With the prevalence of the "sanctity of labor" trend of thoughts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in the company of workers" became a voice respond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 From the lectures given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Popular Education Lecture Group to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the opening of the Labor Supplementary School with preliminary communist thought in Changxindian by intellectuals, and then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Labor Union Secretariat, the Northern Branch based on the work of the Changxindian labor movement to organize workers' organizations in various northern regions, the entire process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deepening mass issues before and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Of them, the "boundary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s" issue had an impact on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organization deepening. Faced with this problem, early communists insisted on taking Marxism as their guide, and firmly strengthened their work among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ragmatically, creatively carrying out a series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s. Eventually, they bridged the boundary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s,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masses of workers, accumulating the initi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carrying out mass work. Hence,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people's stance and implementing the mass line.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 work; boundary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s; the mass line

[责任编辑: 徐文粉]